



△ 1937年，伍連德(右一)與黃淑瓊(右二)在北京協和醫院參加長子婚禮。



△ 當時人們佩戴的「伍氏口罩」。

## 「甚愛福州」 防疫先驅伍連德



△ 伍連德



△ 伍連德與黃淑瓊

1910年10月，中華大地爆發有史以來最嚴重的鼠疫，一旦感染，死亡率100%。病毒席卷東北，波及河北、山東等地，一時舉國震動。

12月，生于南洋，學成于英國，連國語都說不好的醫者伍連德臨危受命，僅帶着一名助手兼翻譯，逆行北上。在疫區，他克服千難萬險，成功領導了這場由中國人主導的防疫行動，撲滅了大瘟疫，救萬民于水火，在列強面前給華人“長了臉”。他將大半生獻給苦難的中國，在中國醫學、中國防疫史上創下了多個世界第一。“科學輸入垂五十年，過中能以學者資格與世界相見者，伍星聯博士一人而已！”梁啟超盛贊他。

可鮮有人知的是，他決絕北上時，“最忠誠的伴侶”黃淑瓊剛剛誕下幼子不久。這位可敬的福州女性，跨過生命的苦難，給予防疫英雄強有力的支持。

### 緣起

1879年(光緒五年)，馬來亞檳城一家經營金鋪的華人家裏，第8個小孩子出生。按照廣東人的習慣，伍姓為“NG”，這個孩子的名字叫做“NG LEAN-TUCK”(伍連德)，是美德相連之意。

伍連德與福建的緣分似乎是天定的。在進私塾的第一天，他遇到了一名叫甘陰吉的福建籍校工，這位校工以閩南話的方式將伍連德用“GNOH LEAN TUCK”寫出來，並告訴他這就是你的英文名。冠以這樣一個閩南話、廣東話混合的英文名，伍連德獲得英國女皇獎學金，成為劍橋大學史上第一位華人醫學博士。

彼時的英國，是鼎盛的“日不落帝

國”，匯聚了世界各地優秀人才；伍連德是來自東方的翹楚。他刻苦求知，硬是囊括了所有可獲得的獎學金，通過博士論文答辯的時間比學校規定的早了2年。

1903年，求學7年，負笈歸來的伍連德年僅24歲，意氣風發。

### 情牽

黃淑瓊，英文名Ruth(譯作“露芙”或“蘿絲”)。二人相遇時，黃淑瓊年方19，待字閨中。“(黃小姐)生得異常美麗，可是她不慕虛榮……有不少有錢的青年向她求婚，她均拒絕，對我卻加以青睞……”多年後，伍連德在自傳裏這樣回憶。人生若祇如初見，可惜佳人已逝，是數十年的生死兩茫茫。

黃淑瓊的姐夫林文慶是英女王獎學金第一個華人獲得者，也曾在劍橋大學從事研究。他爽快同意弟弟暫居新加坡家中，方便就近辦理相關進修事務。黃淑瓊也正在此做客。

姐妹倆的父親黃乃裳是福州近代教育的拓荒者。他一生重視教育，把子女都送進西式學堂。黃淑瓊與姐姐黃瑞瓊從小在福州“毓英女子寄宿學校”(現為福州十六中)接受了西式教育。

姐姐是最早赴美留學的中國女性之一。她精通英文，在回國船上偶遇李鴻章時，被力邀代表清廷參加世界婦女大會，最終因故未能成行。黃淑瓊的風姿與才情不遜于姐姐。20多年後，她的3本英文小說《楊貴妃》《西施：美人中的美人》《王昭君：被放逐的美人》在歐美發行并多次再版。

兩人相遇時，黃淑瓊追求者眾多。其中一位是已成名的華人律師呂

旺相。呂生同為女皇獎學金獲得者，早于伍連德進劍橋大學讀書，後為東南亞首位英國華人爵士。此外還有富甲一方的地產大亨陳烈烈等。“待業青年”伍連德難免心生退意。

幸而在林文慶的鼓勵下，隨後兩周，伍連德常有時間與黃淑瓊獨處。一次，伍連德談起在英與二舅林國祥以及譚學衡、程璧光等清廷海軍軍官見面的事情，祇見黃淑瓊眼含淚水說道：“我的三叔當年是‘致遠’艦的二副，在甲午海戰中殉國了。”伍連德想起15歲時，三舅林國祥殉國消息傳來，母親悲痛欲絕的神情，內心同感悲傷：“我的三舅也是在那一戰殉國的。”黃昏下，兩人相顧落淚。

多年後有人說，黃淑瓊選擇了伍連德，就選擇了漂泊與聚少離多，卻為苦難的中國“選拔”了一位國士。人生路漫漫，黃淑瓊作出的選擇又何止這一次？

### 相離

1905年7月，他倆在新加坡舉行婚禮。隨後，一封祖國的邀請函寄了過來。“我們華夏兒女，本當為國效力”，黃淑瓊不愧是黃乃裳的女兒，在妻子的鼓勵與支持下，1907年，伍連德人生中第一次回到祖國，任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

1910年中國風雨飄搖，清廷搖搖欲墜。中俄日交界處，一場震驚世界的疫情爆發。10月25日，東北滿洲裏一家客棧裏，一名客人先發燒後咳嗽吐血，不到5日就因呼吸困難而死。隨後1個月裏，客棧頻繁出現客人暴死。店老板關店回家過年卻突然暴斃身

亡，家族上下53口人，32口死亡，整個村幾乎成了鬼村。更可怕的是，這種情形很快遍布東北，哈爾濱是第一個淪陷的大城市。12月初，哈爾濱每日死亡人數達到100多人。東北疫情“如水泄地，似火燎原”，傳遍整個東三省，平均每月死亡1萬人，很多家庭舉家暴斃。

清政府惶恐不已，經近代著名外交官施肇基力排眾議舉薦，伍連德被派往防疫。他暫別妻兒，帶著決絕之心，冒着生命危險，逆行北上。疫情由沙俄傳入中國，沙俄和日本卻向清政府桐言，若無力遏制疫情，他們將出手控制東北。蠶食中國國土之心昭然若揭。彼時的伍連德，身負肩負着東北1400萬人口的生死，身後承載着整個清朝和全中國人民的安危。

生命至上，他小心求證。通過解剖死者尸體，發現鼠疫桿菌，在世界範圍內第一個提出“肺鼠疫”；果斷提出封疫區、專設隔離區、戴口罩、實行火葬等一系列在當時難上加難，至今行之有效的防疫措施。他設計出由醫用紗布和棉花制作而成的“伍氏口罩”，倍受歡迎，被認為是N95口罩的前身。

在他的領導下，不到4個月的時間，中國成功控制并撲滅烈性傳染病，取得人類防疫歷史上的第一次偉大勝利。1911年春暖花開之際，中國舉辦萬國鼠疫研究會，向全世界分享防疫經驗和學術成果。110年前的這屆國際醫學學術會議，伍連德因防疫頭功，“一戰封神”，成為當仁不讓的主席，是首位擔任世界學術會議主席的華人。

“我榮幸的擔任這會議主席，但也深深地感到它的重擔，這在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它將使中國在促進人類幸福的國家中占有一席之地。”會上，11個國家的醫學專家齊聚，伍連德一朝成名天下知，贏得掌聲雷動。

成功的背後是沉重的代價。這廂，丈夫在東北英勇抗疫，因身體原因留在天津的黃淑瓊卻經歷了人生最慘痛的遭遇。出生僅6個月的幼子長明因誤食不幹淨的牛奶引起細菌感染，離開了人世。黃淑瓊悲痛不已，卻暫時將消息隱瞞了下來，直到疫情穩定後才致信告知丈夫。她的身心受到極大打擊，此後又經歷磨難，再未能徹底康復，也未能常陪丈夫身邊。

“我們的婚姻，亦不能謂因彼此相愛甚深而完全幸福。由于我常年奔走外方，她必須留在北京，過着寂寞的生活。不過我也是很顧慮對方的，因此我每到一處，總有信寄她。”

### 失愛

1937年是伍連德人生跌宕起伏的一年。這年，按照他的規劃與期望，長子伍長庚學成回國，就職于北京協和醫院。同年，長庚成家，黃淑瓊勉力支撐，在兒子婚禮後便因病去世，終年53歲。

她幼年裹足直至6歲才擺脫，故而

步行總略有不便；少時染上結核病，纏綿終身。可這樣一位看似文弱的纖纖女性，卻胸有丘壑，腹有乾坤。她是最早用英文在國外發表著作的中國女性之一，最早向國際傳播中華文化的使者之一；關鍵時刻，她的建議總能使伍連德在亂世中獨善其身，獲得官方認可，專心從事科研和防疫工作，數次打退鼠疫、霍亂，并主持興辦了20所檢疫所、醫院、研究所，創建中華醫學會，力促收回海港檢疫主權……

黃淑瓊的離開對伍連德打擊很大。他仿佛一下子蒼老了，輝煌的事業也彷彿隨着妻子的離開與戰爭的蔓延而戛然而止。

同年7月7日，“七七事變”宣告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伍連德在上海的工作場所——吳淞檢疫醫院，住所——檢疫處長官邸均毀于日軍轟炸下。他被迫舉家回馬暫避。

可是1942年底(又有說1941年底)，長庚因深入貧民窟，不幸染病在北京去逝，將年輕的生命獻給了公共衛生事業。身在海外的伍連德因戰亂，連回京的路費都籌不齊。他祇能獨自整理回憶錄，時常提及夫人：“在較早的時候，我們常一起旅行，國內到過蘇州、杭州、西湖、南京、福州、廣州。”“受夫人影響，我正和她相似，甚愛福州。我曾和親友們游歷福州鄉區，欣賞那些分散在郊區的廟宇。福州之菜肴也是最好的，尤其是清蒸的魚。福州的女子，不論是受教育的或處在鄉間的，都是溫柔可愛的。”

由于妻子深受結核病之苦，伍連德發現中國傳統共食習慣易傳播結核病，分食制又無法被接納。反復考慮後，他發明了介于共食與分食之間的進食法，就是現在常見的旋轉餐臺加公筷的方法。這種方法被廣泛運用于海內外餐館內，卻鮮有人知道它的發明者是懷着愛妻之心、關懷世人健康的華裔醫者伍連德。

### 傳承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伍連德主動提出把在北京東城的東堂子胡同55號(後為4、6號)樓房捐贈給中華醫學會，以表達他對新中國的熱愛。“我曾將我的大半生奉獻給古老的中國……新中國政府的成立，將使這個偉大的國家幸福繁榮。”

1959年，他從馬來西亞怡保市斯裏井巷93號診所退休，買下老家檳城鄰新慶街39號的房子。搬入一周後，1960年1月21日，因心臟病發病故，享年82歲。

60多年後，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經濟、社會、民生陷入危機。無數醫者義無反顧投入防疫第一線，追隨伍連德的防疫之路，戰疫情，守護生命。

2021年，伍連德誕辰142周年的當天，他制作口罩的0版圖片被全球訪問量最大網站——Google 登在主頁封面上。“生日快樂！口罩背後的男人……”世人深情緬懷他。(朱婷/文)

深秋時節，我走進了位于寧化西部的美麗鄉村——石壁鎮楊邊村。剛至村口，眼前就展示出一幅美麗的畫卷：新房棟棟、河水清清，尤其是客家大酒壺、客家水車、禾口缸鉢等雕塑景觀奪人眼球，這些物件無不顯露出濃鬱的客家祖地風情。而那用形狀不一的陶缸巧妙疊起似寶塔的“禾口缸鉢”雕塑卻勾住了我流連的腳步。駐足細觀，底部用幾十個中等圓形的缸鉢緊緊圍成5個圓圈，中間高高聳立起4個大缸鉢。有的缸口朝上，有的缸口向下，有的缸口朝左，有的向右，變化多端而錯落有致。眾多的缸鉢把人帶進了古樸的手工制陶時代，一個個黑褐錫亮的陶缸好似飽經滄桑的老人向我們敘說陶缸悠久的歷史。

身旁的村支書告訴我，“禾口缸鉢”是石壁(舊時稱禾口)的傳統特產。早在明代，村民就開始以黏土為原料制作陶器，至今已有400多年歷史。這些缸鉢都是手工土法制作的。過去因受封建土地私有制對取土的限制影響，加上交通不便、運銷困難，產品祇限于小罐、鉢、烟筒、小火爐、小水缸等日常生活用品，不能滿足村民日益增長的生活所需。因為陶器胎質粗鬆，有良好的吸水性，用于貯藏谷子、大米、酒釀等東西，不易

## 遠去的禾口缸鉢

潮濕，不易腐爛變質，又幹淨實用，很受村民歡迎。後來陶器品種越來越多，特別是容量大的水缸應運而生，滿足了農村人口多的人家貯水之需。聽了村支書介紹，我心中納悶着：當年如何會想到做“大水缸”呢？

村支書興趣盎然地給我講了一個民間傳說：相傳，清朝末年禾口山下村出了一位大力士，名叫張本田，他能舞動120斤重的鐵關刀。那年汀州府開武科考，他扛着那把鐵關刀下科應試，得中武秀才。因武秀才不能當官而賦閑在家，為了生計，張本田屈身賣力從事陶業，從此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因為難度很大，手工制作容量大的水缸是一般制陶者不敢問津的，他因能制作裝五擔水(約600斤)容量的大水缸，一改過去祇能做小件陶器的局面而名噪一時。當做好的缸坯要搬到室外晾曬時，一般制陶者難以搬動，而他祇要兩手輕輕托起就行；大水缸坯要倒轉曬時，他用雙手夾住缸坯運氣，使缸坯在空中翻個筋鬥，然

後輕輕放下，缸坯不變形，呼吸不喘氣，臉孔不變色。裝窯、出窯他能兩手各提一個60來斤的大水缸坯，象提“小燈籠”一樣輕巧。因禾口增加了大容量品種，制陶業也因之起色。

我想，石壁陶缸品種繁多、遠近聞名應該取決3個主因：一是得天獨厚的黏性泥土；二是手工制陶技藝的精湛；三是經過烈火的煅燒。石壁位于武夷山中段之東麓。自古以來森林茂盛，地勢平坦，土質肥沃，擁有大量的黏土，這資源豐富的原料是制陶基礎。加上聰明能幹的石壁客家先民用汗水和巧手，經挖泥、煉泥，再制作成各種各樣精美的陶坯，上釉後放入陶窯中，經過熊熊烈火(大致1000℃高溫)的煅燒才使原始的、質樸的、粗糲的陶坯變成細膩的、光潔的精致的陶器品。最後運輸到各地銷售。凝視一個個精美的缸鉢，好似聽到陶窯中柴火“噼噼剝剝”的燃燒聲，看到窯火在烈烈揚揚地翔舞。那就是火，永不熄滅的人類文明之火！我想，若沒有人類文明

之火，再好的黏土也還是黏土，也不會變成這黑亮光滑、實用美觀的陶缸。

沉思中，村支書說：“我帶你到村民家中看看。”我隨他走進村民家，看到幾個大水缸、播鉢、酒罈、花鉢等陶制品，問起村民皆說：“這土裏氣的陶器，我們都喜歡，既實用又防潮。”有一位老者還和我聊了許久，回味無窮地說：當年村中還流傳着一首民謠“禾口山上難長草，地下黏土是個寶，能工巧匠過手，死泥變成活鈔票”。

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後“石壁陶器”曾一度走紅過，辦起了“禾口鄉陶器廠”，曾創年產值30多萬元，給村民增加了收入。其產品遠銷江西瑞金、寧都、石城、廣昌及福建三明、南平、龍岩等地。後因種種原因，主要是手工操作繁重，經濟效益不佳等所致，陶器廠停產了。

老村民的一席話，讓我感受到手工陶器也許會被現代機械化生產的陶器所代替，這雖然是時代發展的必然，但這頗受民間鄉民喜歡的手工陶器將漸行漸遠，慢慢退卻歷史舞臺，總讓人心生失落。而那古樸的民間手工制陶工藝將永存心間，客家先人開拓創新的精神和聰明能幹的品質，將激勵我前行。(連允東)